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天下与帝国

中美民族主体性比较研究

江宁康 著

民族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民族主要特性及民族自我意识民族自我意识民族主要特性及民族自我意识。

它作为民族传统的集体记忆和价值体系之价值体系之有的集体记忆和价值体系之中。

“天下观念政治文化观念的核心特征观念的核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核心特征，

对于我们理解两国间的秩序时不同的战略思维方式战略思维方式秩序时不同的战略思维方式，

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天下与帝国

中美民族主体性比较研究

江宁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与帝国：中美民族主体性比较研究 / 江宁康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 朱瀛泉主编)

ISBN 978-7-305-06733-4

I. ①天… II. ①江… III. ①民族性—对比研究—中国、美国 IV. ①C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012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朱瀛泉主编

书名 天下与帝国——中美民族主体性比较研究

著者 江宁康

责任编辑 蒋桂琴 编辑热线 025-83592123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3 字数 364 千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733-4

定价 4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 (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朱瀛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局面。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足于过去的“国际政治”。18 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所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今 200 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知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而生长发展,是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同国家战略目标与和平发展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过去的30年间,我国这个领域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自觉有了显著的提高,一是增强了把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的意识,二是致力于建立学术研究与国际关系实践中新问题、新趋势的联系。这些努力使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保持了应有的活力。而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与外部世界交融的日趋密切,我们的学科建设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坐标上,创建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的愿景。我们知道,世界政治是一个连续性和可变性并存的社会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任务不仅要说明国际体系怎样变化,而且要说明应该怎样变化,因而它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实践与命运、具有规范性研究特性的学科。美英等西方国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时间比较长,基础理论发达,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在学理上认真学习借鉴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特别是主流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经验及其对现代历史的理解构建起来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或思想判断上的偏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正在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作为理论思维的指导,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化之路不能重蹈西方的老路,它完全有可能建立在将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结合并以此来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础上,以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规范要求。任何的学术进步和理论创新只有在扬弃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惟有循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会实现共同的愿景。

本套丛书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依托国家“985”工程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而组织筹划,并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从2009年起陆续出版。本套丛书的出版,既受泽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之优良学统的浸润,更得惠于丛书作者们之激奋于时代和国

家发展的感召。本丛书的意旨在以全球视域为基点,结合有关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着重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丛书内容丰富,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体性、20 世纪以来的国际史、全球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大国外交和战略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历史和现状三大领域。我们希望,本套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丛书的出版,将对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事业有所帮助。是所望焉,谨此序。

2008 年 10 月于南京

目 录

总 序	i
引 论 全球市场与文明冲突	1
第一章 敬天意识与使命意识 ——敬天事家与因信自立	23
第二章 民族意识与帝国意识 ——坚韧自强与内敛外扬	83
第三章 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 ——安土守成与求变逐新	142
第四章 今生意识与来世意识 ——礼俗认同与灵肉两难	199
第五章 变通意识与竞争意识 ——克己务实与尊强好胜	263
结 语 民族特性与天下秩序	323
后 记	336
主要参考文献	338
索 引	347

引论 全球市场与文明冲突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止一个,中国却是保持了三千多年连续性文字历史记载的唯一大国;中国是世界上经历了最多悲欢离合的国家之一,然而这个古老国家却依靠坚韧自强等民族特性一再从衰落、分裂状态中重新崛起。中国人一向以史为鉴,因为中国人有着数千年多姿多彩、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所以中国人也积累了最丰富的人世经历和民族智慧。统一、复兴、衰败、分裂、战乱、再统一、再复兴,以至繁荣发展等一个个螺旋式循环显示着人类文明的另一种运行轨迹,人类社会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日,中国又一次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姿态崛起于东方,并开始参与重建新的天下秩序。这与五百年前西方文明开始全球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五百多年前,中国人尚未形成“全球”的观念,“天圆地方”的空间意识使中国人自古就形成了“四海一家”或“天下一家”的世界观念。这也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东亚大陆型农耕文明的“天下”观念。1405年,就在明朝永乐皇帝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宣威天下之时,西欧诸国也在跃跃欲试地派遣探险船队试图远渡重洋,打开一条通向东方富庶之地的海上航路。但是,两种文明海外扩张的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农耕社会大陆民族的守成特性令中国人的庞大舰队海上昙花一现,海外远航很快戛然而止,大明帝国再次退入自己封闭的农耕疆界之中,并且终日防范北疆之外的强敌入侵,因而失去了走向现代工业化的历史时机;工商社会海洋民族的扩张特性却使西方诸国从此跨出自己国家的边界,不断向外扩张,西方大国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并把东方世界变成了西方大国压迫和掠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可以说,中西诸国在15世纪初开始的海外探险及其不同的结局成了中西文明兴衰、世界秩序重构的一个分水岭。这

正如恩里克·迪塞尔所指出的,1492年(是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是世界新体系第四阶段的发轫点。当时虽然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都具有推动这个体系形成的潜力,但是,“中国自我封闭,而且不想从事此时葡萄牙人正在做的事。它的内部政治局面——大约是官绅阶层与新兴的商业宦官之间的对抗——妨碍了它对外贸易的发展”。^①历史也许就是由偶然性所掩盖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而事实上自那时起,大陆型农耕文明和海洋型工商文明的全球性交汇与冲突也就一发而不可收,直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五百多年以后的今日,中国的海军编队再次出现在郑和船队曾经远航过的大洋之上,与西方各国海军共同担负起了国际航道的护航任务。东西方文明在五百年里的兴衰更替令人感慨万千,而这种历时太久的国运变化,对于现代国家历史只有数百年的西方民族来说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沧海桑田、朝代更迭、分合聚散的天下秩序演变却是一种常态。

从1405年直到1433年,明朝的郑和船队总共进行了七次远航,其构成包括航行、后勤、作战等三部分总共二百四十多艘大小船只、两万七千多名水手,抵达过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其规模远远超过西方探险家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的几艘船、百十号人的远洋冒险。但是,中国船队除了追剿反叛明成祖的余党和用丝绸、铜铁器和瓷器等交换南洋的香料、药材、珠宝以及珍禽异兽外,更重要的是以“天命天君”的名义宣威于周边“藩夷”,使其臣服中央帝国,以建立起九州一统、万邦来朝的大明天下。所以说,明朝初年的海外扩张只是传统中国大陆型农耕文明的延续,是带有“怀柔远人”意味的睦邻外交和以物易物型的“集市贸易”,远不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帝国军事征服和殖民地不平等贸易。15世纪以后,西欧诸国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在工商业逐渐兴盛和城市社会日益繁荣的情形下,西方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国度和市场的狭小。他们在追寻财富的欲望刺激下跨过汪洋大海,以求开辟通往东方市场的海上贸易通道。与郑和船队肩负着睦邻外交与和平宣威的目的不同,西方人的海外扩张从一开始就有军事占领和殖民掠夺的特征,即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征。

^① 恩里克·迪塞尔:“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见詹明信等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在 15 世纪,葡萄牙人率先开始了海外扩张。葡萄牙航海家堂·恩里克王子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建立起一所航海学校来培养远洋水手,并领导了葡萄牙最初的海外探险。接着,葡萄牙探险家于 1445 年跨过大西洋到达了非洲的佛得角和塞内加尔,从此非洲地区的黄金、白银、象牙和香料等财富不断地被运往欧洲。1492 年,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赞助的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率领三艘船只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他们发现了住在这片繁茂土地上的美洲印第安人是“非常礼让的种族,他们平等相待,没有杀戮或偷盗,也不带武器”^①。虽然哥伦布船队的船只大小不到郑和船队大船吨位的十分之一,但是他却冒险跨过了大西洋,把新世界的财富和梦想带到欧洲人的面前。在这些新发现的鼓舞下,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于 1497 年受葡萄牙国王委派,率领四艘船经大西洋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再穿越印度洋,在惊涛骇浪中于次年抵达印度的西岸,发现了真正的东方世界。到了 1519 年,西方人的海外探险达到顶峰,是年由麦哲伦率领的五艘船只从西班牙出发,历经三个多月的海上艰辛远航,终于到达了亚洲太平洋上的菲律宾群岛。麦哲伦死后,他的属下驾驶最后仅剩的一只船,从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历经三年返回了西班牙。

麦哲伦船队环绕世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西方大国完成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海外探险,并在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勾画了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雏形,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力量迅速向全球扩张。正如哥伦布在日记中所透露的,对财富的欲望、欧洲人口过剩和宗教等种种原因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首先开始了海外扩张,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欧洲诸国紧随其后越过高山、跨过大洋向全球扩张。乔治·拉伦认为,美洲的发现和征服至关重要,因为它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处在同一时期。近代民族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以认识“他者”异质文化为前提的,在征服美洲等殖民地的过程中,西方中心意识也在对“他者”的价值、特性及生活方式的区分中得到了增强。^② 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兴起,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扩张也使世界资本主义

① Paul Lauter et al. (ed.),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1, 2nd edition, Lexington: D. C. Heath & Company, 1994, p. 124.

②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4 页。

市场迅速扩展,这个过程必然地、或迟或早地要把其他民族和国家都卷入进来。于是,近代历史上的全球市场建构就开始从西欧北美向世界各地延伸,经过无数的国家间战争与征服,直到五百余年后的今日形成了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包含几乎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商品和资本的巨大市场。

圣·西门曾经提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使各国建立起新的贸易关系,这就为建立某种经济共同体提供了条件,并引导出新的国际主义运动。圣·西门的追随者巴扎尔在1831年出版的刊物《全球》(*Globe*)上大力宣传这种乌托邦理想,并号召在欧洲建立一个圣·西门教派。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将会推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使各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壁垒日益变得不可能,因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的本质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性,也认识到了民族文化和精神生产世界性的必然趋势。他们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从那时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古老民族的森严壁垒,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和各种形式的帝国扩张一直没有停止,西方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994年版,第276页。

② 同上。

的游戏规则成了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导力量。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民族国家纷纷摆脱殖民主义控制取得了民族独立,但由西方控制的全球市场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罗伯特·凯伯把经济全球化的原因首先归结为从蒸汽机到计算机的技术革命,其次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环境,第三则是生产结构的全球性布局,例如在 20 世纪末,全球性生产共享的制造业占据了世界贸易的大约 30% 份额。^① 这个数据表明,全球化进程大大地增加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显然也增加了各国经济以及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经济交往,也是政治和文化的碰撞与交锋。冷战结束以后,非西方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新兴国家仍然要面对西方大国在全球市场上占有的话语权和控制权,特别是受到美元霸权控制下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所左右。实际上,20 世纪末的全球市场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帮助下更加迅速地扩张,各个新兴大国及欧共体成员国的经济活动在全球市场上遇到了美国和美元的双重霸权: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霸权和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经济霸权。可以说,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美元帝国过度扩张与现代生产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使西方长期控制的全球市场秩序遭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但是,东西方之间在全球市场上的这场挑战和应战才刚刚开始,经济领域里的各种商业行为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2009 年 6 月,中国中铝集团涉及到将近 200 亿美元的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计划被毁约,这个海外投资失败案例和 2007 年中国中石油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失败案例都说明,全球市场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由市场”,而且还是东西方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综合力量的一个角力场所。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全盛时代第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于“市场调节”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也许就是“国家实力”的强弱变化,后者对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从文化政治的视野看,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也是东西方文明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一场冲突,是不同的民族特性在经济领域里的

① 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原毅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 页。

现实反映。例如,中国人克己守成、坚韧自强的民族特性帮助中国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美元外汇,如今甚至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人;而美国人借贷消费、追求享受的社会风气促使这个国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并直接引起了次贷危机的爆发。尽管中美两国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一时的状况,是两种发展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共生现象,但是,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民族特性层面的根源却是不可轻视的,而中美两国民族特性和文化习俗的差异更是值得注意。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世界秩序重建的挑战在于,非西方的新兴国家开始崛起于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中国、印度、东南亚、巴西及中东等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与西方经济的减缓甚至停滞形成对照。可以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也表明新兴国家在资源、资金、商品、人才、技术和市场等几个关键方面与西方工业国家形成了互相竞争的关系,而美国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霸主”显然会首当其冲受到挑战。这种全球性的“竞争与交往关系”,或者说,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同在一个全球大市场上进行竞争并相互交往的关系,是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所没有过的,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五百年以来所没有过的。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永不衰落的霸权。事实上,今日美国的霸权正在面临最严峻的挑战。目前世界各国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西方工业国家在领先了东方民族数个世纪以后,正在经历其殖民体系解体以来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即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的历史转折。这个转折产生的背景是严酷的全球市场竞争环境,即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全球市场上展开对于资源、市场、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的激烈竞争。作为西方大国之首的美国虽然实力强大,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也不得不受到市场规律的左右。任何企业或国家放任资本的过度投机必然遭遇失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说,全球市场上非西方国家的生产能力已经威胁到西方大国传统优势地位的话,那么,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将进一步为西方培育自己的强大市场竞争对手。彼得·卡赞斯坦曾经指出:“美国发现自己正在陷入全球化罗网之中,而美国为织成这张网也耗费了自己的一份力量。”^①这个判断是很有见识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英文影印版, p. 532.

的,因为全球化的起始阶段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美国在跃居世界霸主地位以后,它的资本势力加剧了在全球的扩张,并促进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令人意外的是,当市场的力量把所有民族都卷入全球化大潮之后,当自由竞争的信条成为全球市场游戏规则之后,美国本身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游戏规则的限制,不得不面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接受重大的挑战。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一张巨大“罗网”,其中的原因既有新兴经济力量对全球市场秩序的挑战,更有非西方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对西方民族特性的文化挑战。这后一种原因,即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的文化挑战体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上,而这也许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其扩张的第四个阶段——全球化时代——所遇到的最复杂,也最具威胁性的历史性转折。

我们如果把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视为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形成的开始阶段的话,那么,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是其发展的第二阶段,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科技革命大发展时期开始的帝国主义扩张就是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①也正是在第三阶段中,美国逐渐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袖。美国在19世纪末取得对西班牙的战争胜利以后一变而成为“两洋大国”,它的帝国扩张锋芒通过原西班牙殖民地关岛和菲律宾直逼中国东南大陆沿海地区。这场战争的胜利使“自由帝国”的理想获得了地理上的巨大释放空间,更使美国人“仗剑行商”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张扬。马汉指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海上扩张的成功与其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有关,即他们对于新领地的兴趣超过了返回家园的念头,其次是他们追求迅速开发新领地资源以实现更大的物质成功。前一点与法国人思乡怀旧的性格形成对照,后一点与西班牙人耽于享乐的倾向有别;而美国人国民性格中具有强烈的求新进取精神,他们追求海上霸权的兴趣来自于这个民族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成功的事业心、对于获利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以及“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 with 独立

① 朱瀛泉认为:“全球性国际体系的最终形成也在同一时期,即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叶。”这个看法与现代中美两国的历史互动进程也相吻合。参见朱瀛泉:“关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些思考”,见朱瀛泉主编:《国际关系评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发展的才干”。^① 马汉是在上个世纪之交时认识到盎格鲁-美利坚民族的这一特性的,他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仍然没有过时,因为美国的资本霸权实际上正在强化而不是在削弱这一民族特性。

民族特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它会受到时代精神的熏陶和重大事件的考验,并形成每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经验和价值体系。民族主体性则是一个民族国家中的多元民族或族群在共同发展、互相融合的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民族主要特性。民族主体性既深藏在民族自我意识之中,也表现在民族主体成员的文化习性之中。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外交政策的制定仍然会受到民族主体性的潜在影响,这就如同中国人会以家庭伦理观念来界定国家间的“兄弟”或“友好邻邦”关系,而美国人会以实用主义观念来区分不同的“盟友”和“对手”那样。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全球市场的游戏规则就成为中国不得不遵从的原则,而这些游戏规则的制作权又是掌握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集团手中。所以说,中国加入 WTO 就意味着与西方人在全球市场上的新一轮竞争又开始了。这次竞争涉及到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是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协调的问题。在涉及市场竞争的基本立场方面,东西方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差异甚至比真正经济实力的差异更有影响力。例如,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会受到大陆型农耕文明或海洋型工商文明的不同影响,因而出现情面与功利、宽容与报复、含混与精细、持久与多变等等不同的处事态度。这些由民族习性差异而导致的不同处事态度甚至会引起国家间的“他者文化误读”或“他国意图误判”。例如据王尔敏的研究,满清政权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曾经就出现过因为措辞含混而导致的重大利益损害。^② 所以说,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与民族特性

① 马汉:《海权论》,萧伟中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8页。此处据原文略有修改。

② 满清王朝的君主专制与文化愚昧导致了对外交往中的屡屡败局,自以为“中央帝国”之君的清朝皇帝对天下大势一再误判,甚至连起码的国家利益——领土主权与国家主权——都不知保护。例如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满清朝廷把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治外法权拱手让给对方而不知,1858年议订的《天津条约》则把长江自出海口至武汉的内河航运权交给英美两国。王尔敏认为,这些外交败局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满清当局不知有西方人《万国公法》所规定的国家主权,而英美列强“把中国人当作美洲红番欺负,实是可鄙行为”。参见王尔敏:《弱国的外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和文化习俗的异同密切关联,而受到民族文化深刻影响的民族特性异同,特别是东西方民族和文化特性的异同更是事关重大的国家间交往等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1838—1918)对美国的国民性展开过深入的分析,他在《美国史》和《论教育》等著作中对美利坚民族特性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的论述影响到19世纪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急剧上升,这使长期被欧洲人轻视的美国形象迅速转变,而两次世界大战取胜的经历更使美国人成为西方世界的英雄和强大民族的代表。二战以后,美国文化伴随着美国商品迅速向全球扩张,文化影响力也随着市场的占有而不断扩散。由于国家间交往也涉及到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而制定规则的国家往往会占据主导性话语地位,这就会导致某种“文化霸权”的出现,例如近年来被人们不断提及的美利坚文化帝国主义霸权。文化霸权是帝国霸权的一种形式,而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则是对抗帝国文化霸权的有力对策,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的丛林法则面前必须具有的清醒认识。但是,文化霸权的扩张往往会引起各民族之间的“他者文化误读”和“他国意图误判”,进而引起各种更大的国家间或民族间冲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冷战结束不久后指出的:

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而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①

塞缪尔·亨廷顿这种文明冲突理论是在1993年正式提出来的,迄今遇到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和论辩。但是,十几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态势,尤其是9·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似乎证实了他的看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法。对于研究中美两国文化认同和民族特性等问题来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中美两国是在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等方面差异很大的多民族共同体,这两个国家民族主体性之间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特性的异同。两国不同的文化身份和思维特征对各自民族特性的形成及演变具有关键意义。对于美国来说,在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当今世界七八个文明疆域里,美国文化仍然会与他者文明产生“分隔、冲突、接触、融合”等四种不同的文化交往形态。对于美国与朝鲜、伊朗及古巴等国家关系来说,它们的文化交往曾经或仍然以分隔和冲突为主;对于美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往来说,其宗教价值观念的差异曾经导致了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对于美国与中国等东方国家来说,其文化交往形态可能包含所有的四种关系。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正在试图改变与一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分隔或文化冲突的状态。但是,这四种文化形态常常是互相关联的,而即使在西方大国内部,例如美国和法国的文化交往也很难说是充分和谐,其间并不缺乏冲突与融合并存的情形。

在各种民族文化交往关系上,我们还要注意到每个民族文化具有的三层组织结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层次结构好比人类身体组织结构中表层皮肤、中层肌肉和深层骨骼这三个层次形态,民族文化也有表层风俗、中层结构和深层观念三种组织形态,这三种文化层面分别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习俗、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三种组织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如人体皮肤组织那样具有更新和再生的活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在表层的生活风俗层面占据了最多的空间,例如中国当代青年人喜欢过西方式情人节和圣诞节,而美国人欣赏中国功夫和爱吃中式菜肴等等。但是,这种交往并不代表在思想观念上的互相认同,有时仍处于对异域风俗的猎奇或表层接触阶段。其次,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差异或类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的接近或疏远,例如中国传统的中央政府高度集权与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之间的差异必然会反映在国家间关系上,这并非全然源于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这种交往的最深层面是不同思想观念的交汇,其持续的时间最为持久但也是最难实现融合的层面。由于各民族文化和历史演变的不同轨迹,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在接触时就会产生冲突,例如19世纪中国人有关“体”和“用”的争论似乎到今日仍然没有真正结束。